

“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从胡先骕的师友网络看“学衡派”的文化旨趣

王 刚

摘 要 胡先骕的师友网络与“继往开来、融贯中西”的文化旨趣相接榫，对于理解“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总的来看，在胡先骕的师友群中，虽然作为“耆宿”的旧学人物与留学生为主体的西学人士在知识结构上各有偏重，但“往”“来”与“中西”之间是互动交融的，这样的格局，不仅可以将“继往开来、融贯中西”落到实处，也使得胡先骕所在“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不仅如此，胡先骕的论敌也从另一翼推进了相关思考，虽“志同道合不合”，但因总体目标一致，完成了从“志同道合不合”到“皆兄弟也”的路径转换，通过刺激与回应，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建构中的特殊力量。

关键词 胡先骕 师友 继往开来 融贯中西 学衡派

作者王刚，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 330022）。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6)07-0206-11

在1920年代，《学衡》杂志及其所在的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言论阵地。植物学家胡先骕是其中的核心成员，并因与胡适的“二胡论战”，而横跨自然与人文的两大界域，在近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许多年后，胡先骕还多次提及“学衡派”的文化旨趣，对当时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的学风高度赞赏，誉之为“南雍精神”。1936年，在《朴学之精神》一文中，他郑重提出：“夫南雍之精神，不仅在提倡科学也，文史诸科名师群彦，亦一时称盛……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①

在这一宣示中，“继往开来、融贯中西”八字最为精要。质言之，这一“职志”不仅是“南雍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胡先骕心目中文化保守主义的理想追求。要义所在，是不遗余力地吸纳古今中西的文化营养。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很重要的就是，找到情趣相投的师友，共同致力于实现文化理想。遵循这样的认知，可以看到，当胡先骕“以友辅仁”之时，他所结交的师友范围极广，极具容纳度，既在“古今”与“中西”之间搭建起了文化桥梁，也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找到了人群载体。

有鉴于此，笔者以胡先骕的师友网络为研究对象，以此来管窥胡氏及“学衡派”的文化旨趣，通过以小见大的历史考察，加深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下面，试作一初步的分析。

一、胡先骕师友群中的老辈学人

胡先骕的好友曾经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治新学之人”，胡氏“不屑附时流俗好”，“乐与耆宿周

① 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合肥：黄山书社，2013年，第557页。

旋，臭味相投，咸酸同好”^①。也即是说，胡先骕喜欢与老辈学人打交道，这在新派人物中显得颇为异类。对于这样的表现，倘仅仅从胡先骕“不屑附时流俗好”，也即是，从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性情方面去加以理解，易失之于浅。结合本论题来看，这样的举动，乃是“继往开来”的“职志”在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胡先骕所结识的“耆宿”，皆是旧式教育下的饱学之士。从特定视角去看，胡先骕“与耆宿周旋”之“乐”，由传统文化的温情所驱动，由此所获得的快乐，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乐。

在近代中国，保守主义是一个义蕴丰富的概念，呈现多维面相，有着历史的动态发展。在晚清时代，国门初开，保守主义聚焦于政治，随着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加深，政治及其依托的制度层面日渐松动，保守主义逐渐以深层的文化问题为核心，学界所艳称的文化保守主义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时至民国，在这一营垒中，除了极少数继承中世纪路径，不能忘情于帝制政治的保守主义者之外，更为主流的，是另一种“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义”。胡逢祥教授指出：

持这种观念的人，虽然也对传统怀有强烈的依恋感，并且十分强调文化变动的历史延续性，始终倾向以传统文化为根底或主体的近代文化建设进路，但却并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社会体制。他们不仅能以理性的姿态看待和认肯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趋势，有的还积极投身推翻封建专制和建设现代民主制度的革命实践。^②

胡先骕及《学衡》诸子正是此种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有意疏离政治，强调文化连续性，反对断裂式的激进变革，思想立场与纯粹的复古主义者判然有别。这一现象的出现，受着思想界新、旧对立的刺激，从特定视角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护卫与内在反应。

考察近代中国的新旧嬗递，除了政治层面的变与不变，在思想文化走势上，日渐趋新是重要特征。在新旧交替中，“喜新厌旧”成了一时风气。尤其是进入民国后，一大批留学生进入思想文化场域的中心地带，他们以新的知识体系和新的思想认知，对旧力量发起了进攻。至“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一情势愈加明显。

罗志田在为胡适写作传记时，一开篇即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很是发人深省。

1919年夏，在一次同台演讲中，有着留学生身份的胡适对于老辈人物章太炎的发言很不以为然。他一上场即宣布：“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随后，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罗志田评述道：

这句话胡适早几年在留学日记中译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他认为此语“可做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如今在这个场合念出来，既是对听众讲，恐怕也是说给太炎先生听的。而且他特别用章太炎不会的英文念出，刻意体现新回来的“我们”与既存之“你们”的区别。^③

从特定视角来看，这里面的“我们”与“你们”成了新旧交替的符号。老辈人物，即便是章太炎这样的顶级学人，也不被新人物看在眼里了。取而代之，自然淘汰，成为“你们”的命运，“我们”——胡适这样的新人物代表了未来与方向。这样的态度立场，在“学衡派”所属的以“五四”时期为核心的1910—1920年代之中，可谓蔚为风气。

桑兵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还注意到的是，老辈学人备受冷落的风气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好转，胡适等人的后辈明显亲近起了老辈学人，桑兵将此称之为“隔代相传”。他说：

与五四一代新派和老辈之间的水火不容迥异，有心向往文史之学的后五四学人，对老辈反而不大排斥。他们中的一些人，与老辈有着包括血缘在内种种社会联系，在1920年代后期学术风气逐渐转移的影响之下，对于老辈的学问相当敬重，入校学习的同时，还拜在老辈门下。^④

出现“隔代相传”，正说明老辈学人身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这种价值在1910—1920年代被遮蔽，呈现出胡先骕所讥讽的：“知今不知古，是谓之聋瞽”^⑤。出现这样的情形，原因很多，但很核心的一条在于，

① 卢弼：《〈怀麓堂诗稿〉序》，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4—5页。

② 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③ 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

④ 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01页。

⑤ 胡先骕：《古风其二》，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90页。另外，此语典出《论衡·谢短》。

在居于主流的新学人士看来，要发展新学术、新文化，就势必要消灭古旧的文化及其各种载体。从而将新旧古今对立了起来，将旧有的价值一笔抹杀。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将这种落后之根铲除，才可由“黑暗”的“古代”，进入辉煌的近现代，民族由此获得新生。罗志田指出：“他们根本仍是认为中国‘文化’已在阻碍作为‘国家’或‘民族’的中国向着变成‘现代的世界文化’这一发展方向前进”^①。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说：“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来替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五千年古国精神文明”是一个“迷梦”。^②直至提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

但对于这样的立场，胡先骕绝不认同。除了民族感情的触动，就学理而言，胡先骕认为，古今中西的文化之间不仅各异，更有同。在他看来，找到新旧之间的共同点，新文化才能获得历史的根基。由此在《朴学之精神》中，胡先骕指出：“不问华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间确有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至理存在，而东西圣人，具有同然焉。”^③进一步言之，倘没有古今一理，在“继往开来”中，“往”“来”之间就是断裂的，“继往”不存，何来的“开来”？倘任由胡适等人斩断传统，这样的文化建设将处于无根无源的境地，靠“移植”和全盘西化，焉有真正的生命力？这样的新文化只能是无根之谈。

但由前已知，在“1920年代后期学术风气逐渐转移”之前，趋新思潮还是强劲的主流，胡先骕等《学衡》诸子的反思每每不为人所理解。基于此点，从特定意义来看，“学衡派”作为对抗时风的潜流，为“隔代相传”导夫先路。而胡先骕不仅是其间的突出者，反映在师友网络中，呈现出老辈人物极多的情形，出现了前所言及的“乐与耆宿周旋”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胡先骕师友群中的老辈或者“耆宿”，并非完全顽固的守旧人物。严格说起来，他们不仅老而不旧，很多在当年还曾是引领风气的新人物。究其实，他们并不排拒新思想，而是由旧入新的历史见证人。与他们结交，能一窥时代的脉路，而不至于成为“知今不知古”的“聋瞽”。

在这样的意识下，胡先骕对于老辈人物做过认真的审视，他将民国时代的“清季文人”分为了五种类型。对于“泥古不化，反对一切新事物”的第一类人群，以及没有操守，“猎食于名公巨卿者，恬不为耻”的第五类人群，自然不将他们视之为师友。另外三类的情况是，“第二类为清季所谓清流”，本是“不能墨守故常”的开明人士，但“仍以颠覆清室为不道，辛亥革命为叛乱，不惜为清室遗老者。”胡先骕谨执弟子礼的沈曾植、陈三立等人就在其中。而“第三类为有志于维新，对于清室初无仇视之心，亦未必以清室之覆、民国之兴，为天维人纪坏灭之巨变，而必以流人遗老终其身者。”胡氏所激赏的俞明震，属于这一类人群。第四类，则为颠覆清廷的革命派章太炎等人。^④

因为胡先骕的世家出身及历史上的师承关系，“耆宿”中很大一部分都可归入第二类、第三类人群，也即是，与清王朝关系甚密的遗老们。进入民国时代，胡先骕的政治立场早已转为共和，所以，他对于遗老之外的前辈，甚至属于第四类的反清人士也同样礼敬，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类人群在“耆宿”中所占数量较少而已。如在“学衡派”中，他与柳诒徵、王伯沆等人关系极好，这些人相对政治立场淡漠，胡先骕作有《同陈伯严、梁慕韩、柳翼谋诸前辈太平门外观桃花》诗，陈伯严即陈三立，当时被视之为遗老；而柳翼谋即柳诒徵，没有遗老倾向，但视之为一体。此外，胡先骕对于曾激烈反满的黄节大为仰慕，作有《题黄晦闻先生〈蒹葭楼诗〉》，对于“攘夷文字存微旨”深表赞许，并在诗注中表示，“然十年中蹉跎，竟未进谒，此平生一大憾事也”。^⑤也就是说，政治立场无论如何，在胡先骕那里，他们皆为“乐与周旋”的“耆宿”。

这些政治立场不同的“耆宿”能够被胡先骕一体视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都是传统学术及文化的载体。这说明，文化，而不是政治，才是胡先骕型保守主义的核心所在。由此，所谓的“继往开来”不是别的，而是聚焦于学术文化的传承不坠。也即胡先骕所说的：“我国民族不可磨灭之精神，足以使吾国文化

①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05页。

② 胡适：《信心与反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9、385页。

③⑤ 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558、99页。

④ 胡先骕：《评俞恪士〈觚庵诗存〉》，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417页。

几废几兴，终不失坠者”。^①这与陈寅恪“文化托命说”的论述，也即“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②可谓神理相通。事实上，陈氏这一著名论说，本就受到过胡先骕的影响，并可追溯到王国维1919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的一番论述。^③王氏提出：

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若先生者，非所谓学术所寄者欤？非所谓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者欤？己未二月，先生年正七十，因书先生之学所以继往开来者，以寿先生。并使世人知先生自兹以往，康强寿考，永永无疆者，固可由天之不亡中国学术卜之矣。^④

在这段论述中，高度评价了沈曾植的学术及文化贡献。在王国维看来，沈氏作为“学术所寄者”，是学术文化“继往开来”的重要一环。也即是，沈曾植之学既继承了前贤，又开启了后学，学术文化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薪火相传中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沿着这样的学术路径，胡先骕所致意再三的“国性”得以成立。由此，王国维将沈氏誉之为“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对于这一评价，胡先骕深以为然，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他特为拈出寿序中的这段论述，并对沈曾植的“贯天人之奥，会中西之通”深致敬意。^⑤

限于主题，有关沈、王的细部问题暂且不论。但由此可知的是，胡先骕对于“耆宿”的敬重，聚焦于文化的托命与传承，在“继往开来”中，展现出“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晚清民国以来，从沈曾植到王国维，再到胡先骕以及陈寅恪，基于这样的意识，古今中西的文化传统得以沟通，胡先骕师友群中的“耆宿”现象，也由此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二、“融贯中西”与西学之士

以师友群的视角来看，胡先骕所推崇的“继往开来”主要聚焦于作为旧学之士的“耆宿”层面，“融贯中西”则与西学之士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然，“耆宿”也有着中西打通的文化诉求，如沈曾植就有着“会中西之通”的一面。这也是胡先骕深为致意之处。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会同”不等于“融贯”，“会同”或者浮于面上的“中西调和”，有时仅为一种中、西的简单相加与比附，事实上，这也是晚清时代中西文化交互时的常态；而“融贯”则需要进入到中、西各自的知识语境之中。这样的结合，仅有态度和立场是不够的，对于中国士人来说，“中学”可不论，但只有真正进入西学系统之中，方能具备“融贯”的知识基础与实践能力。

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晚清时代的士人，除了严复等少数知识分子具备西学能力，大多不通西洋语言文字，更别说直接阅读原典，从总体来看，知识理论的“融贯”无可依附，无法实现。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之后，由晚清遗留下来的士人，即便是沈氏这样的顶级大师，在“中西”之间，也明显“中”有余，“西”不足，“中西”之间并不平衡。质言之，旧学之士虽然也力图吸纳西学，但主要是意识上的重视，因知识结构上的缺陷，所获得的西学知识大多间接且浅陋。随着留学海外以及直接阅读西典在知识阶层中形成风气，在晚清转入民国之后，下一代具有西学背景的学人，方真正开始了“融贯”进程。其中，《学衡》诸子是最为重要的代表。

虽然同是文化保守主义，但如果与同期的其他同类流派作比较，比如东方文化派；或者梁漱溟等新儒家早期人物，可以发现的是，后者虽然熏染西学之风，甚至引领新风尚，但就学术理路而言，依旧植根于“中学”知识土壤。与之不同的是，就理论背景而言，“学衡派”呼应世界性的人文主义思潮，与“一战”后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相接榫。就知识基础来说，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思想追求中，以西学为知识武器，理论宗主来自西方。也正因为如此，在争夺西学正统中，《学衡》诸子与胡适等人产生了直接的思想冲突。

① 胡先骕：《致熊纯如先生论改革赣省教育书》，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主编：《胡先骕文存》（上），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325页。

②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47页。

③ 具体论述可参看王刚：《陈寅恪“文化托命”说的用典及义蕴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24年第5期。

④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20页。

⑤ 胡先骕：《忏盦丛话》，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673页。

所以，对于“学衡派”尤其是胡先骕而言，在承接与护卫传统的基础上，在建设新的文化系统的进程中，“中学”固然要守卫，西学更是锐利的武器。

在这样的视域下，沈卫威发现，“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有明显的知识元典精神的崇拜倾向。为了论证胡适等人在西学上的浅薄，引用、借助的是白璧德的基本观点”。^①从本质上来看，“知识元典精神的崇拜”，是对于学理的重视，也是学人之间学习交流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这样的知识倾向并非只体现在西学之上，但既然是“融贯中西”，中、西知识体系需要内在的有机结合。“耆宿”们能够吸引胡先骕，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知识元典上具有深厚的造诣，只不过，这种元典为传统的“中学”典籍。当历史转入民国之后，在“融贯中西”的过程中，对于西学也需有着同样，甚至更为严苛的知识元典精神，仅有西学意识，而不能直面西学文本，在文化话语权上将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这，也正是“学衡派”优长于东方文化派及新儒家早期人物之处，更别说此前西学欠缺的传统士人及国粹派知识分子等。

典型例子是翻译名家林纾，同时，他也是胡先骕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晚清时代的林纾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与严复并称“严林”。但与严复不同，林纾不通外文，通过转译而写就作品。在风气始开的晚清能风靡一时，到了民国时代，随着胡适等留学生“你们”“我们”的意识勃兴，林纾不仅成了“异端”及“他者”，更失去了“融贯中西”的资格。于是，胡适在鼓吹“文学革命”时，将林纾作为了反面典型进行批判。胡先骕与之起而论战，捍卫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固然是最根本的原因，但一个直接的导火索乃是，为自己的老师打抱不平。在胡先骕看来，林纾之所以受到胡适等人攻击而处于劣势，乃在于“惜不通西文，未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终不能居上风，遂在一时代之风尚下，首作牺牲矣”。^②以此观之，胡先骕以及“学衡派”在起而卫道之时，最主要的武器不再是“中学”，而是“西学”对“西学”，从而出现了“西与西斗”的情形。^③

在此进程中，胡先骕等人是否真能做到“融贯中西”？抑或仅是“并置”或“选择性吸纳”？可以见仁见智。但自始至终，胡氏在很认真地吸纳西学理论，并以此作为武器，与文化激进主义者展开了论争。落实于本论题的事实是，胡先骕与胡适的“二胡论战”成了《学衡》杂志创办的引线，同时也是胡先骕在“西与西斗”中，以西学武器来建构文化保守主义路径的序幕。

以此为起点，西学的力量加持，不仅落实于文化理论方面，而且还有自然科学的方法路径。

所以，当胡先骕从西方文艺理论出发，与胡适进行全面的文学论战时，所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指出：“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来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的，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④郑振铎所说的“胡梅辈”，胡，指的就是胡先骕；梅，则是梅光迪。

如果再进一步细加分辨，还可以发现的是，在“学衡派”营垒中，柳诒徵作为“耆宿”，“中学”深厚，但西学为其短板。同为西学之士的梅光迪一则比较疏懒，少作文字，故而在与胡适的论战时，冲锋陷阵更前的，居然是植物学为主业的胡先骕。二则文理兼通的胡先骕不仅对于西方理论十分精通，而且善作长篇大论。至于梅光迪，主要是短章文字，思想影响及逻辑性有限，吴宓也是如此。除了长于具体编务，吴宓也少有与胡适长篇大论的论战文章。以至于青年时代的钱穆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学衡》杂志为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刘伯明、梅光迪诸人所主持，创刊于民国十一年，隐然与北大胡、陈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运动为对抗。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诸人曾有意介绍美人白璧德氏之人文主义，亦以零篇短章，未为读者所注意也。^⑤

① 沈卫威：《“学衡派”与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② 胡宗刚：《胡先骕年谱长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③ 具体情形可参看王刚：《文化危机与知识应对：从胡先骕的知识结构看〈学衡〉的文化保守主义》，王刚：《古文献与学术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另外，罗志田最早提出“西与西斗”的观点，《文化危机与知识应对》一文以胡先骕及“学衡派”为研究对象，对此作了展开和论述。

④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⑤ 钱穆：《最近期之学术思想》，见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7页。（此书为钱氏课堂讲义之整理稿，完成于1928年）

不仅如此，在文化论战中，作为植物分类学专家的胡先骕，以科学对科学，也成为制约胡适的重要法宝，这是其他《学衡》诸子所无法企及、无以替代的地方，也是他对于“学衡派”的最大贡献。例如，对于胡先骕最为重要的论战文章《评〈尝试集〉》，沈卫威指出：“个人的学术专长是植物分类，他用科学的统计分类法，把胡适的《尝试集》作了如此科学的肢解，该诗集的尝试精神、创新精神和开一代新诗风的时代精神完全化整为零了”。^①即使是今天看来，胡先骕文章中透现出的逻辑性、科学性也是极为严密的。《评〈尝试集〉》以质上的逻辑推演、量上的数目统计为基础展开讨论，这是胡适以前的论敌中所没有的。

在这样的时代风尚和学术取向，不仅胡先骕本人在《学衡》诸子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其师友群中，西学之士亦是不可或缺的板块。

西学来自西方，胡先骕留洋多年，在西方学界有不少的师友。依据一般认知，西学之士中应有大量的外国学人。但问题是，胡先骕的主业为自然科学，他所结识并来往密切的外国学人，主要在植物学领域之内。比如在他所就读的哈佛大学，“除了与导师杰克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之外，还与哈佛的其他植物学家如 Memill、Rohder 等建立良好的学术交往，与他们一直保持通讯联系直到 1949 年，胡先骕所领导的事业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②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学衡派”精神领袖的白璧德也是哈佛大学的名教授。但在 1923 年再度赴美之前，胡先骕并未见过白氏，更别说白氏门下的其他外国学人。胡先骕是在国内通过吴宓、梅光迪而了解白璧德，并在 1922 年成为了白氏《中西人文教育谈》的首译者，甚至白璧德的中文译名也是由胡先骕所定，自此广为接受。此后胡先骕服膺并引据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论作，深受其思想影响，并在赴美后专门拜谒了这位哲人。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如下的格局：与胡先骕交往密切的外国师友主要为植物学及自然科学的专家。在人文领域，“西学之士”主要还是中国人，并且在国内交往者居多。

之所以如此，一则因专业所限，胡先骕毕竟是自然科学的从业者，深入于欧美人文社科领域去结识相关学者，是不现实的。二则胡先骕心目中的“西学”之士，有着中国本位要求，从而“融贯中西”，发扬国性。而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主流欧美人文学者少有这样的自觉性。事实上，白璧德能成为“学衡派”的理论宗主，正在于他有着跨文化的中西打通意识，他的弟子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中国，如梅光迪、吴宓等。

由此，在胡先骕师友群中，西学之士的核心人群是留学生群体，尤其是“学衡派”那批留学生为重中之重。但与胡适不同的是，这批留学生不再以西学背景为准绳，傲慢地强分“我们”与“你们”。而是郑重声明，“我们”与“你们”之间本就有着合辙之处，更重要的问题是，反过来不承认胡适等人所主张的西学。西学阵营中的“我们”不再是铁板一块，因对传统所持的立场，有了分化与斗争。

也由此，在“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贯中西为职志”的论述中，胡先骕特为指出：“在欧西文哲之学，自刘伯明、梅迪生、吴雨僧、汤锡予诸先生主讲以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始为吾国士夫所辨认。”并论及了“提倡本位文化”的重要性。^③细绎以上论述，在胡先骕心目中，从刘伯明到汤锡予，这些“学衡派”，及与“学衡派”立场相契合的留学生，之所以是西学之士的杰出代表，主要体现在两大层面，一是“提倡本位文化”；二是输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

而这两点恰恰是迥异时流的，是时代风气刺激下的反应。具体说来，当时占据学界主流的胡适等人推动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西学之士，引发了胡先骕极大的不满。在他看来，这样的行为带来了中国教育文化的巨大危机，为此撰文指出，胡适等人所提倡的，是一种功利主义，不仅没有进入西方文化中最精深的层面，而且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一些糟粕隐然引入。更令人担忧的是，胡适等人挟留学生的名头与文化威势，“以欧美留学生而提倡功利主义，诋毁旧学，自不难有风行草偃之势。”倘任其发展，“西方文化之危机已挟西方文化而俱来，国性已将完全湮灭。吾黄胄之前途，方日趋于黑暗乎？”^④

① 沈卫威：《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53 页。

② 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年，第 67 页。

③ 胡先骕：《朴学之精神》，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 558 页。

④ 胡先骕：《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主编：《胡先骕文存》（上），第 87、83 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胡先骕与“学衡派”起而卫道之时，不仅是为了本国文化及国性的保存，同时也在西学层面正本清源，即提倡“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在深刻的忧患意识中，胡先骕师友群中的西学之士立足于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性视野及跨文化眼光下，反对中西对立，力图在“融贯中西”中，实现本位文化的近现代转型。

需要指出的是，为文化保守主义建构提供助力的西学之士，不是只有与之同时代的留学生们。胡先骕的眼光由此上移，对于输入西学的留学生群体，作了历史的审视，并对于第一代留学代表的严复极为推崇，称颂其“博览贯中西，晚年尤见道”。^① 要义所在，以西学之士而不忘文化本位，作为极具家国情怀的“治新学之人”，以实现传统学术文化的生存发展及近代转型，作为“天责”所在。从严复到胡先骕，思想上有继承，亦有发展。在历史的追寻中，从严复“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到胡先骕将功利主义向着人文主义转向，从而更加符合“王道政治”的需要，在“通贯中西”中，着力实现“宏恢圣道”的目标。

当然，还需要看到的是，晚年严复思想转向悲观，与胡先骕的积极建构姿态有所不同，而此时胡先骕何以还要推崇严氏呢？就本论题出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在排拒胡适为代表的留学生时，胡先骕将严复作为留学生中“融贯中西”，从而“起国魂”的最早代表，作为留学生的精神遗产，严复已有文化图腾的意味，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以浇胸中块垒。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专文加以考察，在此不再赘论。^②

事实上，这样的路径选择，也的确使得这种“中介性西学”存在着难入堂奥的阻隔，构成其“融贯中西”的局限。由此而进，对于白璧德理论的理解，是否准确或是否有着误读，都成为可以讨论的问题。然而，自晚清以来，本就存在着“借洋权威以张中学”之策略，严复当年就是如此，胡先骕等人虽然更为精细入微，但本质上一致。这种历史的局限，受着现实条件的驱动。孰是孰非，如何评说，已溢出了本文的主题范畴。就本论题出发，可见的事实是，在胡先骕的师友群中，虽然作为“耆宿”的旧学人物与留学生为主体的西学人士在知识结构上各有偏重，但“往”“来”与“中西”之间是互动交融的，这样的格局，不仅可以将“继往开来、融贯中西”落到实处，也使得胡先骕的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三、文化保守主义建构视野下的“二胡”之争

作为胡先骕论战对手的胡适，因其激进主义的立场，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面。但这样的一种存在，并非可有可无。从特定视角来看，正是因为胡适的存在与挑战，逼使着胡先骕对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赓续与走向，进行了日渐深入的理论思考。在思想交锋中，问题意识日渐明确，逻辑层次更加完整严密，可以说，胡适的种种思想刺激，从反方向推进了胡先骕文化保守主义的建构。

西汉的司马谈在论及“百家争鸣”时，引《易经》之语，得出了“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的评价。^③ 与诸子百家“殊途同归”相仿佛，胡先骕与胡适之间虽也发生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但总体目标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是“同归”之人。

那么，“同归”于何处呢？答案是现代社会的新文化建设。胡先骕说：“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独不敢为鲁莽灭裂之举，而以白话推倒文言耳”。^④ 由此可知，在改良文学以及新文化建设上，“二胡”之间并无根本分歧。胡先骕甚至坦陈：“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以此视角加以评判，胡先骕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就不是所谓的复古与倒退，而是新文学及新文化的另一翼。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学衡派）并非一味的“反动”，他们甚至和新派文人也有资源共享。在传统文化如何转型以及如何“融化新知”方面，包括对新文学以及激进思潮某些弊病的批评方面，“学衡派”不乏冷静的见识，起码在学理上

① 胡先骕：《楼居杂诗（其七）》，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 207 页。

② 王刚：《思想取向与知识路径：胡先骕学人品性的形成与严复影响》，《地方文化研究》2023 年第 3 期。

③ 《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

④ 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 269 页。

可以给新派文人一些提醒与纠偏。^①

沿着这样的逻辑理路，笔者曾撰文提出：“学衡派是新文学激进派的补偏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才使得新文学增加了更多的理性色彩，不至于在脱离传统的轨道上走得太远，而这些也正是学衡派对于新文学的价值所在。”^②

限于主题和篇幅，对此不再细论。由本论题出发，可确立的事实是，胡先骕虽然与胡适一样“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但在“殊途同归”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由此可谓“志同道不合”。因为这样的缘故，一方面二人在思想道路上各持己见，甚至于胡先骕对胡适有了恶评，但另一方面，胡先骕对于胡适的才华高度认可，对其思想价值亦非全盘否定，甚至在年少时一度主动订交。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在考察“二胡”之间的文化关系时，激烈对抗固然是可见的主要一面，是为“异”。但另一面的事实是，他们之间也有着“同”的旨趣。反映在二人的交际上，曾经是好友，后来因论战的缘故，虽有疏远甚至对立，但师友关系并未完全断绝。

在这样的意识下，可发现的是，当1916年11月，在美国的胡适开始写作《文学改良刍议》，掀开新文学运动序幕时，所选择的具体攻击点正是“吾友胡先骕”^③，“吾友”二字表明，二人属于师友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间来到1940年代后期，在中研院会议期间，二人再逢于南京。此时，青涩后生皆已成为学界巨子。二人在与其他几位胡姓学者合影留念时，胡适在照片上挥笔写下了“皆兄弟也”的文字。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胡适一时兴起的应付之语。因为此时的胡先骕与胡适一起批评国民党政府，写了不少立场相似的时评文章，甚至还鼓动胡适竞选总统。胡宗刚评价道：“他们都是有意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自由主义者”。^④此时的“二胡”，虽然在文化取向上一如几十年前，一主文化保守主义，一主文化激进主义，时间的推移，没有消弭他们在文化哲学上的根本分歧。但在现代知识分子及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上，二人成了同辙并轨之人。

也就是说，“二胡”之间虽在文化取向上有着激烈的对立，但因两者“志同”，也能找到共同取向，从而互为影响。典型例子，是1927年11月14日胡先骕与吴宓的一次会谈。当日下午，经吴宓引见，胡先骕与陈寅恪匆匆一晤之后，胡、吴二人有了一次重要的叙谈。按照吴宓的本意，希望胡先骕继续支持他办理《学衡》杂志。但此时“学衡派”内部对于吴宓的不满已经积聚到了一定程度，致使此前梅光迪与吴宓正式分道扬镳。在此情形下，胡先骕提出五点意见：

（一）专心生物学，不能多作文。（二）胡适对我颇好，等等。且谓（三）《学衡》缺点太多，且成为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所不喜。业已玷污，无可补救。（四）今可改在南京出版，由柳、汤、王易三人主编。（五）但须先将现有之《学衡》停办，完全另行改组。^⑤

就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而论，胡、吴之间没有根本对立，这可以由日后的行事及文字中得以证明。在晚年给吴宓的赠诗中，胡先骕还对当年《学衡》时代所持立场引以为傲，有着“差喜当年豪气在，期君身作后凋松”^⑥的吟咏。但有学者注意到，胡先骕对于吴宓主持《学衡》杂志时，有着“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所不喜”的评述，由此认为胡先骕不喜欢“旧式谈国学者”，甚至推断陈、胡之间的会面，也是基于此点，最终不欢而散。^⑦

然而，这一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对于陈寅恪，胡先骕评价极高，誉之为：“吾国今代通儒第一人，虽王静庵、章太炎不能比拟”。^⑧在其眼中，陈寅恪不是“旧式”学者，而是代表“今代”的“通儒”。更何况，真的是“旧式”学者，如沈曾植等人，胡先骕亦崇敬有加，并无轻视之处。胡先骕的态度是“继往开来”。“继

① 温儒敏：《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话——围绕初期新文学的评价》，《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② 王刚：《“二胡论战”与〈学衡〉时代的胡先骕》，王刚：《古文献与学术史论稿》，第258页。

③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3页。

④ 胡宗刚：《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第133页。

⑤ 胡宗刚：《胡先骕年谱长编》，第125页。

⑥ 胡先骕：《得吴雨僧书却寄》，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150页。

⑦ 张源：《从“人文主义”到“保守主义”：〈学衡〉中的白璧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62—163页。

⑧ 胡先骕：《与吴宗慈论〈陈三立传略〉意见书》，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587页。

往”需要旧的根基；但只见“旧”，而未有“新”，则无法“开来”。如果说胡适有“新”无“旧”，容易遁入无根之谈。那么，吴宓的作为，在于见“旧”不见“新”，这应该才是胡先骕提出反对意见的根由。但由此一点可以看到的是，他与胡适没有彻底决裂，而且关系尚好。细绎这一耐人寻味的事实，如果不是完全囿于私人关系或人情世故的考量，那么，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二胡”之间的交往，有着“志同道合”中的“志同”为基础。

要之，胡先骕与胡适之间有同有异。这些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建构，皆发生了推动作用。就“同”的一面来说，都致力于新文化建设，只是前行的路径不同。极端一点说，那个反传统的胡适，也延承传统文化资源，如中国古代的白话文传统，如对乾嘉之学的推崇与继承。甚至，在其“整理国故”运动与“学衡派”的“昌明国粹”之间，也能找到某种隐秘的共鸣。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胡适的思想立场是激进的，至少以断裂的态度示人，缺乏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由此，胡适影响越大，越要消除这种“误入歧路”的影响，这不仅是胡先骕的一大情结，更增强了他从反方向建设新文化的迫切性与自觉意识。

还需一提的是，胡先骕及“学衡派”选择的主要对手是胡适，而对于陈独秀等人往往忽略。这种忽略是有意的。

西方社会学家在研究知识群体时，曾将其分为真理战士与党派圣哲（the partisan sage），这两者明显有别，“真理战士希望他信为绝对真理的体系能在逻辑上取得胜利；而党派圣哲则力争他及群体所代表的行动趋势在社会上取得胜利”。^① 认同真正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学者，总是将自己标榜为前者；而社会改革家则多归于后者。胡适所认同的无疑是前者，他强调自己的学人身份，最终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选择路径的不同所致。同样的，胡先骕及“学衡派”淡化政治，强调文化，是致力于非政治化的学人群。由前已知，胡先骕与胡适一样，对于自由主义有着高度认同，这主要就是因“真理战士”的立场所致。所以胡适成了主要论敌，而不是态度更激进的陈独秀等人。^②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二胡”之间所认同的“真理”道路各不相同，作为“二胡”之“异”的核心，这成为他们之间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就基本面来说，“二胡”一主激进，一主保守。但倘进一步细加分疏，接下来不禁要问的是，胡先骕反对胡适的具体理由是什么呢？这些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建构有什么影响呢？

以笔者浅见，“二胡”之间的认知差异聚焦于三大层面：

一是就行为方式而言，胡适以激进的态度推倒传统，强调古今中西之间的思想对立。而胡先骕及文化保守主义者希望尊重固有文化，在稳步推进中保持“国性”，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质言之，理想追求一致，但对其学风与立场不能苟同。

二是两者之间的理论宗主不同。在“西与西斗”之中，胡先骕及“学衡派”服膺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而胡适则信奉与功利主义合拍，讲求当下效果的实验主义。在《朴学之精神》中，胡先骕有这样的思想总结：“自《学衡》杂志出，而学术界之视听以正，人文主义乃得以与实验主义分庭而抗礼。”^③ 就本论题出发，可注意的是，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尊重传统，对于孔子思想亦推崇备至，并挖掘其所具的世界性意义。以此为逻辑起点，在白氏眼中，尊崇孔子思想的中国古代社会，亦有自己的人文主义，也即是，“中国古时以一种教育系统维持之。”他一再提醒，在这一系统遭到抛弃之后，“宜注意，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这些思想论述深刻影响了胡先骕，以此为理论基础，面对着“吾国文化今日之濒于破产”的危局，胡先骕在《说今日教育之危机》中提出了谨防“倾水弃儿之病”以及“尚椽弃珠”的倾向。言锋所指，就是胡适为代表的文化取向。^④

三是在应和时流与引领社会民众方面，“二胡”之间有着不同的取向，一般来说，胡适聚焦于前者，而胡先骕更为看重后者价值。当然，这两方面并非截然二分，胡先骕是时代的产物，也要跟随时代的脚步，

① 弗·兹纳涅茨基（F. Znaniecki）：《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郑斌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② 具体论证可参看王刚：《“二胡论战”与〈学衡〉时代的胡先骕》，王刚：《古文献与学术史论稿》。

③ 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558页。

④ 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主编：《胡先骕文存》（上），第79、85、83页。

并非完全抗拒不变；胡适也注重启蒙，不是只有迎合。但总的来看，出于实用主义及功利的考量，胡适所津津乐道的是当下效果，并以文化进化论的眼光来看待新旧事物。反映在文化建设上，以白话文、白话诗来代替典雅的传统文学及文化，以一“生”一“死”为喻，来建构势若水火的对立。而胡先骕则力主，传统文学及文化有其不竭的生命力，绝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抹杀其永恒价值。它们不是死文学或死文化，对其作出历史的承接与转换，才是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

这是“二胡论战”的核心所在。到底谁更有道理，可以见仁见智。但问题的关键是，胡适评判优劣的依据，是当下的接受度。由此，在“二胡论战”硝烟未散之时，他根据自己的新诗集《尝试集》的畅销，力证其正确性，以证明以古文作诗文，没有生命力。在此基础上，撰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宣布胡先骕等“学衡派”主张的“过时”。并在1922年3月间，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再次断言：“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①但在胡先骕看来，只问真不真，对不对，不看过不过时。为此，作《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不仅从理论上作出回应，而且极为沉痛地指出：“一种运动之价值，初不系于其成败，而一时之风行亦不足为成功之征。”胡先骕认为，胡适受到民众的欢迎，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以新闻式文学家之天才，秉犀利之笔，恃偏颇之论，以逢迎青年喜新厌故之心理，风从草偃，一唱百和”。^②

由此可知，在胡先骕的眼中，文学或文化有着自己独立的发展及尊严，不可自降品格，以迎合时代。不唯如此，知识分子还需肩负引导民众的责任。胡先骕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弘毅卫道的责任已由士大夫转而到了欧美留学生之身，这些人作为“中国社会之领袖”，“居左右社会之地位，则宜自思其责任之重大，而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心”。^③这样的认知，与当年留学时所宣示的“以正人心风俗为己任”以及“宏恢圣道”云云，可谓一脉相承，并蕴藉着浓郁的传统士大夫气息。《论语·泰伯》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④正是此论所本。当年胡先骕对于胡适寄予厚望，希望他与自己一起共担重任，而现在胡适迎合时流，这当然让胡先骕大为不满。

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胡先骕这种精英主义的路径，传统的影响固然是一方面，同时它也是白璧德人文主义的要求。在胡先骕所译的《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中，明确提出：“文化非赖群众所可维持，……必托命于少数超群之领袖。”^⑤正可说明这一点。

总之，在中西融通的大背景下，未来中国的文化走向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核心问题。因应着这样的时代命题，二胡之间大目标一致，在“殊途同归”中开辟出了新文化建设的不同路径。在胡适的刺激下，“吾友胡先骕”的人文主义取向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因其挑战，作出了针对性的回应，从反方向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建构与发展。

四、结语

胡先骕的交友圈主要集中于学人群，而且出于对文化传统的热爱与赓续，大量人文社科层面的学人与其发生密切的关联或交集，从不同层面，以不同视角，对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与“继往开来、融贯中西”的文化旨趣相接榫，对于理解“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此为视域来考察胡先骕的师友圈及其所产生的思想文化作用，可以看到，一方面，胡先骕从老辈学人中吸取传统文化的养分，通过“乐与耆宿周旋”，亲近传统，沟通中西之同，实现“文化托命”，从而达到“继往开来”的目标。另一方面，更在“融贯中西”中，与“西学之士”共同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在“提倡本位文化”的同时，以输入“欧西文化之真实精神”为旨归，从而实现文化保守主义的理想。总的来看，在胡先骕的师友群中，虽然作为“耆宿”的旧学人物与留学生为主体的西学人士在知识结构上各有偏重，但“往”“来”与“中西”之间是互动交融的，这样的格局，不仅可以将“继往开来、融贯中西”落到

① 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419页。

② 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衡之罪恶》，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431、526页。

③ 胡先骕：《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张大为、胡德熙、胡德焜主编：《胡先骕文存》（上），第89—90页。

④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4页。

⑤ 熊盛元、胡启鹏编校：《胡先骕诗文集》，第362页。

实处，也使得胡先骕的文化保守主义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由此，胡先骕的思想并非孤明独造，而是受着外界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很重要的因素，来自他在学界的师友群，他们直接影响甚至参与了胡先骕文化保守主义的建构。然而，站在胡先骕的立场，对这些师友的态度，又反映了他在文化选择上的自我意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内外之间的师友互动，是其文化保守主义得以历史行进并最终定型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相反相成的是，虽处边缘，但不可忽略的是，胡先骕的论敌也从另一翼推进了相关思考，虽“志同道合”，但因总体目标一致，完成了从“志同道合”到“皆兄弟也”的路径转换，通过刺激与回应，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建构中的特殊力量。

在学术史的视野下，“胡先骕的师友网络”是一个个案，但又不仅是一个个案，它更是重审 20 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复杂性的棱镜。它的后面，有着传统与现代的交互融通，更有着时代的风潮，有着域外的视野及理论资源。在全球现代化转型与反思中，作为中国样板，文明对话结构、知识体制变迁等宏观脉络隐于其后，在 20 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版图中，皆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限于水平，笔者还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完全的展开，而是聚焦于思想史个案或人际网络的微观重构，作出了一些粗浅的分析。倘能由此抛砖引玉，引起海内外方家的后续研究，从而获得进一步的思想文化图景及深入的成果，则本文也算有了一些微弱的存在价值。

（责任编辑：周 奇）

Viewing the Cultural Intent of the “Xueheng School” from Hu Xiansu’s Teachers and Friends’s Group

WANG Gang

Abstract: In Hu Xiansu’s teachers and friends group, although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knowledge structures between the “elders” and the Western scholars who were mainl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re was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past”, “future”,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This pattern not only implements the concept of “carrying forward the past and opening up the future,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ut also made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m of Hu’s “Xueheng School” open and inclusive. Not only that, Hu Xiansu’s opponent in the debate also had pushed forward relevant thinking from the other side. Through stimulation and response, they became a special for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

Key words: Hu Xiansu, teachers and friends, carrying forward the past and opening up the future,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Xueheng School